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

翟振武

【提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人口问题产生和变化的原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了解人口问题的“人口方案”与“经济方案”的相互联系。从长期的角度分析人口增长影响的结论不能盲目应用到时期性的人口政策设计上。本文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分析有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人口数量过多,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第二,中国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仅依赖人口总量的缩减,而主要应依赖发展,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在人口控制潜力基本释放殆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二个结论可能更重要。

【作者】 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人口问题数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众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自然而然,讨论人口问题的巨大吸引力在中国也长盛不衰。进入20世纪以来,先有陈长衡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大旗,拉开了中国人口问题大讨论的序幕,再有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尔萨斯的严厉斥责;40年代末,又出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关于人口多是否是中国贫穷和革命原因的论战;新中国成立后,先有马寅初先生率先发表《新人口论》,极力主张人口控制,全国节制生育高潮呼之欲出,而后却又风云突变,横遭批判,沉冤二十载;1972年再有中央痛下决心,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群众运动,倾全力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终成中国的基本国策。综观历史与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人口问题倾注了如此大的关心,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人口理论探索方面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并走过如此艰辛曲折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了人口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一、人口怎么会成为问题

“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生命活动和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类生命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一定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不断变化。由于人口的某一要素或某几个要素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各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所谓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等。人口现象本身是一种中性现象,如出生率的高低、人口增长的快慢、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分布的疏密等本无所谓好坏之分,也不存在“问题”与“非问题”之说。古代的中国人口缓慢增长了几千年,似乎那个时代的人并没有把这种缓慢增长看作是什么“问题”。欧洲的死亡率、出生率递次下降,人口转变过程历经几百年,欧洲人描述了这种现象,探寻了这种现象发生的社会经济原因,但也没有人把人口转变本身当作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口现象置放在特定的国家,置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它们便有可能成为了问题或不成为问题。

对一个资源稀少的地区来说(比如中国),快速的人口增长显然是问题,而对一个资源丰富、劳动力短缺的地区(比如俄罗斯),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而是一件大受欢迎的好事。同样的人口状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水平下对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人口问题也是不同的。有的国家面临的是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題,有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有的却是人口迁

移问题。同一种人口现象,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这说明人口问题本身从一开始就是同发展问题紧密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观察,至少可以得到两个判断:(1) 人口问题是相对性的问题。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相适应则安,不相适应则成问题。无论是索维的适度人口论,还是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他们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围绕着“适应”而展开的。(2) 既然“不适应”是人口问题的根源,那么,适应还是不适应,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衡量: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含技术水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如果不能适应现有的经济状况,可判断为存在人口问题;另一方面,在人口数量结构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能否适应现有的人口状况,当然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经济问题”。到底是人口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取决于观察者以人口还是以经济为前提条件。

二、什么是中国最大的人口问题

在当今的中国,什么是最大的人口问题呢?答案恐怕是现成的——那就是人口过多。庞大的人口规模始终像头顶上的一把悬剑,时时威胁着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翻一翻近 100 年来人口学的文献,“人满为患”、“超载的土地”、“不堪重负”、“瓶颈”、“硬约束”等词汇俯首即是。毋庸讳言,中国人口是过多了,但令研究者们感兴趣的是,如果说今天的近 13 亿人口是过多了,那为什么 4.5 亿时也说人口过多呢?中国人口过多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认识和理论的源泉。回顾一下历史,对我们深入认识人口问题的本质有很大的好处。

中国进入 20 世纪以后,面临着无比巨大的生存压力。广大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每年几百万人死于饥饿。极端的贫困、连年的战争和不断的灾荒把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压得更加喘不过气来。中国为什么如此贫穷落后?很多人把目光落在了巨大的人口规模上。“中国今日民贫之一最大原因,厥为人民滋生太繁”。^①“有些人以为中国的乱源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帝国主义何以能够以小役大,以寡犯众,和以后进压迫先进呢?可见我们不能用外因来解释中国的贫弱,中国的贫困自有其更为复杂更为重大的内因。据我的观察,各种内因之最大者莫如‘无教无养的小孩子们的哭声比别的国家尤多’。这种哭声比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我国的领海内河所发生的炮声尤令人感觉不安”^②。显然,陈长衡在这里没有理解人口问题的本质,他只是肤浅地从人多地少出发,简单化地解释中国人民贫困是因为“人口多”。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口总数仅为 4 亿多,远未达到所谓中国土地承载能力的极限。当时的人口过多,并不是人口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多,而是相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导致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过多。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同样是这片土地,在 90 年代却以高出 30 年代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生活水平成功地养活了近 13 亿人口。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问题之所以显得那么突出和急迫,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致使中国人民陷入极端贫穷境地的结果。贫穷,突出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但是,人口规模绝不是贫穷的根源。欧洲人口密度远低于中国,无教无养的小孩子的哭声也比中国少得多,但那里照样有饥寒交迫的工人,照样有贫穷潦倒的农民。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仅经过 3 年的恢复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城市的失业问题和农村的饥饿问题。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

① 陈长衡:《中国人口论》,商务印书馆,1918 年,99 页。

② 陈长衡:《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商务印书馆,1930 年,248 页。

个巨大变化的事实说明,当时所谓的人口问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根源却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是经济发展不足。

中国人口问题的再次令人瞩目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2 000 多万人死于饥饿。中国人民又一次痛苦地亲身感受到了人口过多的沉重压力。但是,造成2 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和经济大倒退的真正原因仍然不是人口规模,因为同样的人口规模在1950~1958年间并没有导致饥饿现象。“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与粮食的严重失衡主要是大跃进的决策失误和制度变迁(建立人民公社)造成的。

中国人口问题第三次成为热点发生在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由于国民经济沦落到崩溃的边缘,人口与粮食的关系极为紧张,所有生活必需品几乎都实行低水平的配给制。在城市中,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找不到工作,成为待业青年,无法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在农村,大批农民逃荒要饭,生活水平大为倒退。经过十几年以粮为纲的奋斗,中国还是不能彻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事实使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并再次把经济搞不上去的板子打在了“人口多”上。诚然,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其耕地只占世界的7%,这个现实确实残酷。粮食紧张的状况无疑与人口多有密切的关系,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人口与粮食紧张状况仅仅是因为人多吗?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占世界7%的耕地真的不能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吗?毫无疑问,中国人口必须要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不管实行怎样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哪怕每个妇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中国人口也要再增长几十年。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现有的人口规模条件下,经济发展能否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拓展出新的空间?

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在生产技术基本没有实质性飞跃的条件下,仅靠制度的创新,粮食生产就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幅度增长。从1978年到1984年,仅仅几年的时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就由3亿吨猛增到4.07亿吨,增幅高达30%。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仓容”的危机(仓库容量装不下当年生产的粮食)。这个喜悦来得太快,也太令人吃惊。而随后的事实更让很多人目瞪口呆。尽管1978~1999年中国多次遭受自然灾害,有些还是几百年一遇的大灾,但中国的粮食供给,包括其他一切副食品供给、生活消费品供给,却一年比一年充裕,“短缺经济”这顶帽子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而供过于求,内需不足,包括粮食内需不足,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最大苦恼之一。应当提醒的是,从1978~1999的20年间,中国人口每年仍以平均1 500万的速度增长,但人口与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却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甚至可以说,至少在目前,人口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们什么启示呢?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之所以有了极大的提高,物质供应之所以得到极大的改善,人口问题之所以得到缓解,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口总量减少了,而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三、理论的启示与思考

如果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研究,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还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众多案例。表1的数据中,国内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人口密度高居全国前列,人均GDP也居前列。内蒙古、甘肃、陕西等省区人口密度低,经济发展也远慢于沿海省份。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数据中(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如加拿

表1 1999年中国各省人口密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省份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江 苏	687	10 025
浙 江	484	11 230
广 东	391	11 112
陕 西	221	3 915
甘 肃	135	3 454
内 蒙 古	65	5 067
宁 夏	202	4 280

资料来源:1999年中国人口数据表,《人口文摘》(增刊),1999年。

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确实位于发达国家行列之中;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几位的国家或地区,却也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非洲的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低于亚洲,但非洲并没有创造经济奇迹。

80 年代中期美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似乎是中性的,没有证据表明人口增长必然阻碍经济发展。50 年代末,美国人口学家寇尔和胡佛对印度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仿真试验后得出结论,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较高的生育率及人口增长率阻碍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则大大有利于人均收入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整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寇尔—胡佛的人口经济模型一直被奉为经典。1984 年美国科学院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否认这个模型,但十分明显的是,它并不支持寇尔—胡佛模型的普遍意义。可以说,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理论模型能全面、清晰、彻底地解释它。但是,在实践的观察上,我们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社会里,特别是在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的现代社会中,某一地域的人口数量多寡,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和强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国家在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时需要仔细考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人口少有人口少的发展道路,人口多也有人口多的发展道路。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只有一种模式的观点显然不符历史和现实的实践。

有人曾假设,如果 50 年代就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我们就不会出现今天各种严重的问题。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判断,即使 50 年代执行了控制人口的政策,在 1959~1961 年的“天灾人祸”中,一样会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凭票供应、知识青年待业、生活资料全面短缺的局面照样会发生。前苏联的人口少,土地多,和中国的人多地少正好是鲜明的对比,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其粮食仍然供不应求,经济依然短缺。可见,无论从理论的推演上,还是从实践的观察上,我们都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产生、恶化和缓解,都与发展的状况紧密相连。事实多次证明,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的解决,除了要靠控制人口增长外,更重要的、更关键的是靠发展经济。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这一命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国际上一系列重大会议,如 1992 年国际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 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都对这个命题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肯定。按照两种生产理论的观点,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必须与人类自身生产相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发展相适应。而这种相适应应该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着眼于调整人口变化的人口政策,当然应力图使人口变化尽可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如降低人口增长率,减轻人口压力等。但在多数情况下,人口变量的调整和变动是一个长期和逐渐的过程,有些甚至会延续几百年,如人口转变过程。在此期间,在调整人口变量的前提下,如何让经济发展适应现实的人口状况,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表 2 1999 年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国家或地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国家或地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加拿大	3	19 640	中国台湾	614	12 872
美国	28	29 080	英国	245	20 870
澳大利亚	2	20 650	比利时	338	26 730
新西兰	14	15 830	荷兰	391	25 830
以色列	294	16 180	瑞士	174	43 060
新加坡	6 525	32 810	苏丹	30	290
香港特区	6 503	25 200	阿尔及利亚	34	1 550
日本	339	38 160	非洲	68	670
韩国	477	10 550	亚洲(不含中国)	283	2 91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咨询局编、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编译:《1999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四、面对现实的选择

从现实意义上说,目前中国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能主要依靠发展。理由有二:

其一,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1995 年已达到 1.86(全国),大大低于更替水平(2.1),并且近些年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说,按照 1995 年的生育水平,妇女平均每人终身仅生 1.8 个孩子。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是在人均国民产值仅 800 美元,农村人口还占 70% 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取得如此之低的生育率水平的。同时期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是 2.1,英国是 1.7,法国是 1.8,但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却全部达到 2 万美元以上,是中国人均国民产值的 25 倍以上(见表 3)。

国际国内的各种研究表明,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很高的因果相关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人均收入、人均教育年限和城市化水平尤为重要。然而,当我们拿这些指标衡量中国时,我们感到无比惊讶。人口政策成为中国国策已经 20 年之久,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的开展,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70 年代开始,脱离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变化的轨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主要是政策因素的作用和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干部的艰苦努力下,仅用了 30 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 5.0 下降到 1.8 左右,创下了世界下降速度之最。总和生育率为 1.8,这已经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考虑到当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 70% 农村人口的事实,坦率地说,这个低水平的取得是极其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个奇迹。今后生育率再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极为有限,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人口控制已基本无潜力可挖。

其二,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各种人口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过低的产物。比如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在今天的瑞典已是现实,老年人口比例高达 17%,但人口老龄化在瑞典并没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现在为 7%,到 2030 年左右才达到 18%,而中国现在就深切感受到“银发”浪潮的巨大压力。其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经济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而中国经济还欠发达,总扶养能力低,难以支持如此巨大的老年人群。所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尽快构筑起强大的物质基础,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也是最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钥匙。再以人口总量增长为例,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虽然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中国人口在今后几十年中还依然呈增长的态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此,政策的决策者和计划生育部门都无计可施,只能被迫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在 2035 年人口总量将要达到 15 亿高峰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面前,我们该怎样去应对和解决人口总量压力带来的各种问题呢?显然,我们的目光、我们的重点、我们的应对措施,只能放到经济的发展上。如果说,我们目前对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理论上还认识不深,还难以全面把握的话,那么,来自中国现实的考察却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人口增长已无余地可调,我们当然只能去调整经济,以适应不可避免的 21 世纪的人口变化。这里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讨论,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被迫的选择。

表 3 中国与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国家	总和生育率	人均国民产值 (美元)	城市人口比重 (%)
中国	1.86	750	31
美国	2.1	29 240	75
英国	1.7	21 410	89
法国	1.8	24 210	74
丹麦	1.7	33 040	85
新加坡	1.5	30 170	100

资料来源:《2000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 年 5 期。

五、如何从长期的角度与短期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讨论,要分清从长期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短期的角度出发。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的数量并不会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现在有近 13 亿人口,2035 年还要达到 15 亿,这确实是一种困难。但是,在 15 亿人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腾飞和发展,仍然可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这个判断有理论上的支持,有实践中的先例(已实现现代化,却与中国人口密度大致相同的国家)。只要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聚精会神地发展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期不动摇,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完全能够最终解决。承认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主张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发展”,并不能否认或弱化中国人口数量控制的重要性。从短期的角度看,当人口与经济发展不适应时,虽然人口压力可以推动经济做出调整,最终适应人口状况,但这种调整是一个过程,甚至可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确实,人多人少不是我们能否实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过多,却会增加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延长我们实现发展目标的时间。中国的资源相对于人口数量还相当贫乏,中国的环境面对现有人口规模还相当脆弱,如果我们的人口总量能尽量少一些,我们的困难就会少一些,我们的发展道路会更平坦一些。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人口现在确实是过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盘古能重新开天地,笔者主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安排3亿人就足够了。因为美国现在也才2亿多人,这个规模的人口并没有妨碍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逊教授认为当今“中国人口一点也不多”,主要依据是新增人口会增加知识总量,而知识总量的增加,会使我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增加更多的财富。很显然,约翰逊教授在这里谈的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对这一点,笔者并不否认。西蒙在他的著作里已将“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讲述的淋漓尽致,约翰逊基本上是重复了西蒙的观点。但是,新增人口并不能天生地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他们要生存,要受教育,而这一切,都需要经济提供支持。在经济总量一定或缓慢增长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大规模地增加教育投资,进而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可行的选择只能是降低人口总量的增长率,使现有人口享受到更好的生存环境,接受更好的教育。约翰逊,包括西蒙,忽视人口数量的短期效应,混淆观察人口问题的长期角度和短期角度,然后将从长期角度观察到的结论盲目应用到短期的人口经济关系分析上,这是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致命的缺陷。试想,当现有的人口还不能获得足够的最低限的教育时(如小学教育或9年教育),多增加人口难道就能多增加知识总量吗?约翰逊教授在论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的:“今天的儿童将来的福利水平并不是取决于他们数量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在他们身上投资的多少”。^①笔者所要补充的是,为了提高今天儿童身上的人均投资量,在整个投资量一定或缓慢增长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减少一些出生数量,以保证所有儿童获得较大的投资量。因为“未来的福利不取决于儿童数量,而取决于儿童质量”。^②这也是中国目前为什么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主要理由。可惜的是,约翰逊教授的论据是对的,但他对中国目前人口总量是否过多,中国目前是否应控制人口这个短期性问题的结论却错了。

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分析的两个基本结论是相互联系的。第一,中国人口数量过多,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第二,中国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仅依赖人口总量的缩减,而主要应依赖发展,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在人口控制潜力基本释放殆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二个结论可能更重要。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①② 约翰逊:《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